

批林批孔学习資料

(批判林彪資產階級軍事路綫)

(十四)

新疆八一农学院政治处编印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目 录

- 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2)
- 二、抗日战争时期…………… (12)
- 三、解放战争时期 (一)…………… (21)
- 四、解放战争时期 (二)…………… (32)
- 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41)

批判林彪資產階級軍事路線

(初 稿)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入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這個時期中，黨內兩條路線鬥爭表現得十分尖銳、複雜、激烈。鬥爭的焦點是中國革命走什麼道路的問題，是要不要革命武裝，要不要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問題。毛主席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科學地分析了當時形勢，英明地指出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必須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必須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毛主席親自領導了秋收起義，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紅軍，在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在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中國革命走什麼道路的問題。而林彪追隨黨內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對革命悲觀失望，反對武裝奪取政權，反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反對黨的領導，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南昌起义后，开小差逃跑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党的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损失。为了回击敌人的疯狂气焰，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林彪在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头，就露出了他的贪生怕死的丑恶灵魂。在起义部队由广东转移到江西大庾时，身为连长的林彪，曾经私自离队，开小差向梅关方向逃跑。由于国民党沿途搜索，打人杀人很厉害，他怕被抓走杀掉，才不得不返回部队。以后，他又多次不执行命令，擅自撤退和逃跑。如：一次他在担任新城赣州方向的警戒，遭敌袭击的战斗中，毛主席指示他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击退敌人，否则对以后转移很不利。他却对这一指示根本不理，竟从毛主席身边一冲而过，率队逃跑；只顾自己保命，不管毛主席面临敌人追击的危险。

在革命队伍里，贪生怕死，当逃兵，是最可耻的。我们革命战士，为了革命利益，不怕苦，不怕死，有一往无前的精神，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才是一个革命战士的崇高品质，而林彪与敌人一接触就向后跑，枪一响就吓破了胆，他的灵魂深处是多么卑鄙。

林彪这个临阵脱逃的行径，是从孔老二那里传下来的，孔老二曾经称赞从战场逃跑的人。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鲁国人跟着国君去打仗，打了三次，三次临阵脱逃。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家里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在战场上，父亲就没有人奉养了。孔老二听到后说，好啊，好啊，还吹捧他是

个“孝子”。这实际上是宣扬逃跑有理、叛徒光荣的谬论。法家韩非、王充在引述这一事例的时候，曾经尖锐地指出，孔老二认为是“孝子”的人，正是国家的叛徒。赞扬这样的人就没有人为国家打仗，国家就要灭亡了。林彪秉承孔老二这种反动思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犯再犯，一直发展到投修叛国，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粪堆。

可是，林彪及其死党为了掩盖罪行，竟篡改历史，无耻地把朱德、陈毅同志率领部队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说成是他带去的，甚至把朱德同志当时使用的扁担，放在林彪展览馆里，也说成是他的。事实上，南昌起义时，他不过是个排、连长，而且是这样一个逃兵，他无耻歪曲历史，这只能说明他的阴谋和野心，而丝毫不能说明别的。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悲观动摇

一九二八年底至一九二九年初，英、美、日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殖民地的斗争已十分尖锐，蒋、桂、冯军阀混战局面已经形成，反革命潮流开始下降，革命潮流开始复兴。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形势，用“星火燎原”来比喻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指出了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正在这时，湘赣军阀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在白色恐怖面前，林彪对革命产生了动摇，他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谬论，根本不相信中国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根本不相信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够建立红色政权。他认为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的，并提出所谓“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搞流动游击的谬论，竭力反对毛主席建立农村根据地的理论和路线。

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中，都深刻阐明了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伟大意义，毛主席说：“**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农村根据地，是红军保存和发展自己，抵御和消灭敌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的战略基地。只有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才能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瓦解和动摇反动统治的基础，才能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促进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相反，如果没有根据地，四处乱撞，搞流动游击，不但不能争取群众，更谈不上建立政权，这样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使革命归于失败。

林彪的所谓流动游击道路，就是走州过府、大吃大喝、招兵买马、逃避斗争的道路；也就是不要根据地的流寇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不但在历史上没有成功的先例，而且在敌强我弱，交通技术进步的今日，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

林彪军事上的流动游击，来源于政治上的右倾悲观，他夸大反革命的力量，不相信中国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对此，毛主席曾经给林彪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封长信，信中说：“我以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你对于时局估量比较悲观的原因，……就是把主观力量看得小一些，把客观力量看得大一些”，“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这就深刻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右倾思想的本质。

林彪长期以来坚持错误路线，对毛主席的批评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九年，他写了一首反动诗词《重上井冈山》，说自己“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灯原”，搞反攻倒算，为自己涂脂抹粉。但是，历史是歪曲不了的，林彪的一首反动诗词，能把当年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懦夫，变成志壮的勇士吗？能把当年流寇主义的代表，变成坚信马列的英雄吗？不能！这只能是他的痴心妄想！毛主席说：“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到光明的人，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林彪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鼓吹短促突击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依仗其军事上的优势，对苏区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围剿”。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三四年九月，蒋介石出动了总兵力共达二百一十万，妄图把红军扼杀在摇篮之中。当时，“围剿”与反“围剿”成了国内战争的主要形式。毛主席向全党明确指出：“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正是根据这种特殊的战争形式，毛主席提出了“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歼灭战”等一整套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制定了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战略战术。英勇的红军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不断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猖狂进攻。红军反“围剿”的胜利，乱了蒋介石的手脚。他慌忙在庐山搞了个军官训练团，请了帝国主义分子当顾问，挖空心思，研究出一个新战术，即所谓堡垒推进政策。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发起了第五次“围剿”，大筑其乌龟壳，妄图以此

蚕食苏区，消灭红军。

当时，窃据党中央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王明，根本无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全盘否定已被斗争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军事路线和作战方针。他在敌人采用堡垒主义新战略的第五次“围剿”面前，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处处抵御，分兵把守”等一整套消极防御的所谓新原则，把党和红军推向了危险的边沿。

林彪追随王明的消极防御。他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到九月六日期间，就连续向军委发了三份电报、两封信，竭力主张堡垒主义和短促突击，并写了《论短促突击》的反动文章。他胡说什么：“我们对堡垒如运用得当，那是有很大作用的”，要部队“守在碉楼内，在碉楼掩护下做群众工作。”他还攻击诱敌深入的方针，“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办法了”，胡说“我军团如经常集结一处，无英雄用武之地”，“我们也仍只能行短促突击，而且很少有大的运动战给我们打的可能”等等。《论短促突击》这篇反动文章，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谬论，渗透了儒家消极防御的毒汁，是他早期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也是他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

毛主席教导我们：“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恩格斯说：“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防御的积极防御”，

“消极的防御，即使有良好武器，也必败无疑。”林彪、王明搞消极防御，反对诱敌深入，鼓吹以堡垒对堡垒，打短促突击的阵地战；反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鼓吹分兵抵御打消耗战，实际上是要丧失我军主动权，葬送中国革命。

林彪这个消极防御的思想，从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看，与儒家的军事思想是一致的。孟轲就是搞消极防御的，他在滕国就主张高墙深沟，专守防御，说什么打败了也是天老爷决定的。法家不是这样，如公元前三四一年齐魏马陵之战，齐国的军事家孙臆就运用了减灶诱敌深入的战法，于马陵地区（今山东鄆县东北）把十万魏国军队打败，最后迫使魏军主将庞涓自杀，还活捉了太子申。汉武帝抗击匈奴，他用了卫青、霍去病两员大将，采用主动出击，避实击虚，奇袭敌人后方的方法，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打败了匈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判地吸收古代军事家的优秀遗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如果按照毛主席的主张，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红军的主力向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突进，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南昌、福州之间，威胁敌人的心脏重地，迫使进攻苏区的敌人回援，就能造成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良好战机。这样，置敌人的堡垒于无用，而红军十分主动，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完全有把握的。但是，王明、林彪之流拚命反对毛主席的正确主张，他们畏敌如虎，在敌人气势汹汹的“围剿”面前惊慌失措，没有胆量打到敌人后方去，又不敢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剩下的只有一条失败的道路。事实的结果就是这样，使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百分之百，红军由三十万人剩下两万余人，这是多么深刻的血的教训。

毛主席说：“据我们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

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而林彪正是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的最愚蠢、最狂妄的人！

在长征路上，大搞分裂活动

红军长征开始时期，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红军再一次陷入了极端危险的境地。广大党员、干部和战士在血的教训中，一致要求结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强烈希望毛主席回来领导党和红军。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实现了全党全军的心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使党和红军在王明错误路线的深渊中得到挽救。从此，毛主席亲自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率领红军由失败走向胜利。在这个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林彪却跳了出来，对抗毛主席的灵活指挥，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一是对抗军委命令，不到扎西集结。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本来打算由宜宾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由于张国焘没有按照中央指示接应中央红军北上，彭德怀土城一仗未能消灭敌军，而蒋介石已调动部队沿江布防，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时刻，毛主席毅然改变原定计划，决定在四川、贵州、云南边境地区寻求新的战略机动，这样就使敌人摆下的阵势没有一点用处，而我军安然地摆脱了困境，争取了主动。这无疑是灵活杰出的指挥，是一次具有伟大气魄的战略行动。但是林彪出于他机会主义的本性，疯狂地对抗这一命令。从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至八日，军委前后八次电示林彪，要他向扎西（威信）集结，林彪却一再

专横地说：弄清我们在何处再给我们命令，擅自把部队带到罗海，与主力愈离愈远。

二是右倾动摇，不敢攻打娄山关。

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敌人拚命尾追，后面空虚，毛主席率领红军掉头东进，占领了桐梓，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贵州军阀王家烈急忙把遵义黔军，调往娄山关及其以南的板桥、黑神庙地区，蒋匪吴奇伟纵队也从贵阳向遵义赶进。军委决心迅速消灭娄山关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开展战局。命令林彪立刻迂回娄山关、黑神庙之敌。但林彪说什么正面攻打娄山关“兵力用不上，且系仰攻”，“赶到娄山关以南，但必极疲劳”。他夸大困难，不敢迅速攻取娄山关。而当占领了黑神庙、板桥地区之后，又动摇徘徊，不敢直下遵义，发展胜利。在军委的批评和督促下，在友邻的影响下，林彪才不得不向遵义前进。我军凌晨进遵义，中午敌吴奇伟部队也即赶到。但敌人晚到一步，我已先敌占领有利地形，击退了吴敌的进攻。如果按照林彪的右倾思想，不但要断送这一即将取得的胜利，而且必然会使红军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

三是勾结彭德怀，反对毛主席领导。

遵义战役胜利后，中央红军北上仁怀，转而佯攻贵阳，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取得了长征中决定性的胜利。红军在毛主席英明指挥下，穿插于敌人之间，生龙活虎，处处主动。敌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北上却又南下。蒋介石几十万大军，被我牵着鼻子走，处处听我调动，疲于奔命。红军广大指战员切身体会到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英明正确，兴高采烈，斗志昂扬。而林彪却悲悲

切切，精神沮丧，把毛主席灵活的战略指挥，诬蔑为“拖垮部队”。渡过金沙江后，林彪又叫嚷什么这样下去不成。一到宿营地，他就给彭德怀打电话，说什么：“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并写信狂妄地要毛主席下台，真是嚣张之极。

在长征路上，林彪扮演的就是这么一个可耻角色。但他却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长征先锋”的模样，掩饰自己的错误，扩大自己的影响。历史是歪曲不了的。反党的先锋，搞阴谋的能手——这才是林彪的真面目。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在我军刚刚建立的时期，林彪就站在错误路线一边，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的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本没有改变，在他的灵魂深处早已埋下了野心家、阴谋家的种子。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内两条政治路线和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中心，是要不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要不要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问题。毛主席从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为我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正确路线，并根据在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给我军明确规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而王明却从极“左”跳到极右，与叛徒刘少奇一起，荒谬地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张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竭力推行投降主义，妄图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依赖国民党。这时，自称“一贯正确”的林彪又破门而出，跟在王明、刘少奇的屁股后面，拚命反对我们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毛主席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壮大革命武装力量的方针；要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双手送给国民党。

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依赖国民党打大仗

早在抗日战争前夕，毛主席预见到抗日群众运动高潮的到来，在党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

量，要猛烈扩大红军，并规定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但是，林彪却拚命抵制中央在山西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他八次蛮横地提出，不在一方面军工作，要到陕南打游击，并以不干为要挟，说什么“宁肯受处分”，也“不改变决心”，与党闹独立。一九三七年秋到一九三八年春，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党中央指示，开赴华北、华中前线抗日。一九三七年八月党召开了洛川会议。会上，毛主席指出，国民党虽然被迫参加了抗日，但是并没有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时刻企图消灭或削弱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必须提高革命警惕，坚持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绝对领导的原则。林彪参加了洛川会议，对毛主席提出的革命路线和战略方针是知道的，但是他一到华北前线就鼓吹什么“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任务”，而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竭力主张我军“集中约一师兵力”在国民党的统一指挥下打运动战。他无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无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而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完全寄托在国民党及其反动军队身上，又一次暴露了他右倾投降的真面貌。

关于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毛主席曾经作了十分明确的阐述。毛主席说：“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由于敌强我弱，敌就占领了我国广大的地盘；由于敌小我大，敌人兵力不足，在占领区不得不留下很多空虚的地方；由于中国的进步，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存在，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

範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如果輕視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不去發展敵後抗日游擊戰爭，壯大人民軍隊，而採用集中主力去同日寇硬拚的話，那麼，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非但沒有取勝的可能，反而會招來嚴重後果；而敵人卻可占我大片領土，毫無後顧之憂。這樣，要戰勝日本侵略者是不可能的。因此，毛主席明確指示：“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自己的一種拿手好戲，……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大仗為主。“要告訴全党，今後沒有別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擊戰爭。”

而林彪卻把毛主席的指示當作耳旁風，他根本無視游擊戰爭，看不起抗日武裝力量，反對我軍分散作戰，他腦子裡沒有黨，沒有群眾，沒有人民戰爭，只迷信國民黨正規軍，硬要集中我軍主力配合國民黨打大仗，打陣地戰。這是非常荒謬的、也是十分有害的。一九四〇年秋，彭德懷發動的百團大戰，就是一例。彭德懷擅自組織的百團大戰，過早地暴露了我軍的力量，使日軍把百分之七十五的侵華兵力和全部偽軍集中進攻解放區，實行了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給抗日革命根據地帶來了很大損失，這是一個極其深刻的教訓！

林彪輕視游擊戰，要打陣地戰的思想，與儒家軍事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儒家主張“不鼓不成列”，要打“堂堂之陣”。林彪也是要擺開攤子，拉開架子打所謂“堂堂之陣”。說到這裡，使我們想起了春秋時候的宋襄公和成公孫的两个故事：公元前六三八年，宋國與強大的楚國作戰，宋兵已經

排列成阵，楚兵正在渡河。宋国有个官员认为楚兵多，宋兵少，主张利用楚兵渡河未毕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后，还没有排成阵，宋国官员又请求出击，宋襄公又说：

“不可，因为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一直等到楚兵准备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国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曾经说过：

“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这是对儒家思想的尖锐批判。楚汉相争时，赵国的成安君（陈余）也是和宋襄公一样的人物。当汉军进攻赵国的时候，成安君不听李左车迂回敌人后方，截断敌人补给，两路夹击汉军的建议，说什么，讲仁义的军队不搞偷袭，要明着干，结果全军覆没，成安君自己被杀死，赵国也灭亡了。三国时的官渡之战，袁绍的谋士建议偷袭许都，袁绍不听，形成了在官渡地区与曹操消极对峙的局面。而曹操抓住战机，敢于亲自率领五千骑兵，打着袁绍的旗号，乘夜晚偷袭鸟巢，取得了打败袁绍，统一北方的决定胜利。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的战术比儒家灵活，法家讲究避实击虚，出奇制胜。孙武子就说过“勿击堂堂之阵”，“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是讲灵活的。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建筑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抗日战争中的运用。这同林彪与儒家机械、死板的战术，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脑瓜里装满了孔孟之道的林彪，不可能理解当时游击战争的伟大意义，他把国民党反动军队视为神物，蔑视新生的、发展的抗日武装，这是他右倾本质决定的。

大写反动文章，反对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

在轰轰烈烈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右倾怕死的林彪，以养病为名，躲到苏联去了，一去就是几年。一九四〇年，正当国民党猖狂发动反共高潮的时候，他在莫斯科公开发表了《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的反动文章，大肆鼓吹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党的武装。他完全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扮演了可耻的叛徒角色。

在这篇反动文章里，他叫嚣“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以最高统帅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周围”。这实际上是出卖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把党对抗日战争中领导权拱手送给国民党蒋介石。关于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领导权问题，毛主席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毛主席说：“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又说，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这个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并告诫全党：“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但是林彪却竭力追随王明、刘少奇，把国民党蒋介石捧上了天，而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根本不放在眼里，他完全站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立场上。林彪还无耻地捏造什么是蒋介石建立和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他眼里，只有蒋介石才是真心实意地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所以，他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由蒋介石国民党来领导。这完全是公开的叛卖。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这是人所共